

當前“一國兩制”實踐中的幾個重大理論問題

常 樂*

十八大以來，中央根據香港社會所出現的一系列新情況、新問題和新挑戰，採取了明顯不同於以往的新政策和新措施。十九大之後，中央治港的原則、方針、目標、方向、政策、措施都更加清晰、定型，“一國兩制”理論更加豐富、完善和成熟，中央治港的制度自信和能力自信也更加堅定、有力，並且香港“一國兩制”實踐也在向有序健康方向發展。然而，一方面香港總有部分人不想看到“國家好、香港更好”局面的出現，因此對中央治港的方略和做法作出歪曲、詆毀和抵制；另一方面內地和香港也有不少人還不能適應中央治港新時代已經到來的這種新變化，他們的思想還停留在過去的一些觀念和想像當中，還不太能夠理解和接受當前中央治港的一些新的理念和做法，從而不能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十九大精神，不能將其全部精力用在“一國兩制”在香港的行穩致遠上。

基於上述考慮，並結合學習十九大精神的一些體會，本文謹就當前“一國兩制”理論和實踐中最易引起爭論、也最易讓人忽視，卻又極其重要的幾個問題嘗試作一剖析，以求推進新時代“一國兩制”的正確實踐。

一、善治之道：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二元調適

(一) 共生、共存與共融

世界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互動和變遷。如果放開歷史的視界，從文藝復興和地理大發現以來觀察人類的整部發展史，我們大致可以得出一個判斷：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就像一對孿生兒，相伴而生，從其產生的環境和條件來看，有很緊密的親緣關係；從其相互鬥爭、相互借鑒和相互吸收對方養分的角度看，二者從來就有着協作關係，或者至少說是並存關係；然而，隨着歷史的日益發展，二者的關係日益緊張，二者的鬥爭性不斷提高，而協作性不斷下降，二者之間的關係要麼老死不相往來，要麼分出高下，形成一定程度的統屬關係。

當資本主義初生並處於上升期時，它的優越性還沒有完全顯現出來，加之它的力量還不足以強大到推翻封建專制政權的統治，因此它必然會包容和團結社會主義的因素和力量，以期形成合力推翻封建統治，建立資產階級統治的國家。當全世界成為以資本主義制度為主導的社會時，資本主義就會走到社會主義的反面，其消極性和與社會主義天然對立的本性就會不斷顯現出來，二者的鬥爭性超過了二者的統一性，其結果就變成兩途：要麼是社會主義推翻資本主義，比如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 中國人民大學台港澳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

蘇聯的誕生；要麼是社會主義托庇於本國資本主義統治之下，逐漸蛻變為具有資產階級性質的社會主義政黨，逐漸接受了資本主義統治的正當性。

在全世界範圍內，一國之內處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關係的兩大典範就是蘇聯和中國。二者作為世界上兩個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採取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對待資本主義的態度，從而兩個社會主義國家也走出了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最簡單地看，蘇聯從其誕生就受到世界資本主義勢力的圍剿和打擊，出現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與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間長達數十年的對立、對抗和“冷戰”狀態。無論從理論還是從實踐來看，這種狀態是一種十分不正常的狀態，那就是這種模式完全忽略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一致性問題。沙皇俄國是一個後發的資本主義國家，它是當時世界資本主義鏈條上最薄弱的環節，因此蘇聯奪取政權、建立社會主義國家之後的首要目的，就是妥善處理好與國內外資本主義的關係，如何發揮它們在發展生產力方面的積極優勢，將自己以及社會主義陣營發展成為經濟力量強大的國家，而不是以封閉保守的視綫將自己塑造成陣營內部以及與外部抗爭的霸權性國家。這樣不僅禍起蕭牆，外力也會通過內力發揮作用，因此蘇聯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最終的消亡似乎也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可以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處理與資本主義的關係走出了一條與蘇聯完全不同的道路。既值得慶幸也頗為遺憾的一件事情是，新中國成立後，中蘇蜜月期並不長，並且中國的發展一直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則，因此當時的國家領導人有能力和足夠空間去處理國內及國際資本主義的關係問題。在國際上，除短期的抗美援朝階段，中國對於世界上的資本主義國家還是採取區別對待的態度，即使與美國處於敵對狀態，但是上世紀 50、60 年代也從沒有中斷過雙方之間的和平談判和秘密接觸，對於英、法、日等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則更是積極拓展民間外交渠道，盡一切可能拓展外部聯繫。而在國內，更是採取了正確的處理資本主義的政策，除沒收國外敵對資本和國內原來的官僚資本外，對於廣大的民族資本則採取合作、合營和逐步“贖買”的政策，在 50、60 年代為中國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以及基本國民經濟體系的建立發揮了重要作用。只是由於後來“左”的錯誤，尤其是“文革”十年的破壞，中斷了社會主義中國借助資本主義盡快實現工業化過程的經濟發展歷程。這一錯誤的代價是沉痛的，但是其經驗也是極其寶貴的，因為它為 70 年代末中國改革開放國策的出台提供了思想和實踐的基礎。

中國當代近 40 年的改革開放史，在一定意義上就是正確處理本國範圍和世界範圍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關係的歷史。社會主義離不開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先行一步的市場制度和經驗、資本運作及社會化、機器化大生產的制度與經驗，尤其是以資本主義制度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實行的現實國際環境，都決定了社會主義必須包容資本主義，並且必須讓資本主義世界包容社會主義。在這個過程中，改革開放之初中國所提出的“一國兩制”方針政策、港澳兩部基本法的出台以及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的建立都是中國的社會主義包容資本主義以及讓世界資本主義包容社會主義中國的堅實的里程碑。

立足當今的中國來看，社會主義較之資本主義具有更為明顯的優越性。一是表現在它汲取了資本主義的市場制度和經驗之後，尤其是在確立了市場在資源配置當中的決定性地位之後，社會主義發展生產力的能力就超越資本主義發展生產力的能力；二是由於社會主義堅定的人民性及其本質的先進性，決定了社會主義具有更高於資本主義的克服政府失靈和解決市場失靈的能力。世界金融危機以來，尤其是十八大以來世界範圍內的社會實踐都充分說明了這一點。當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疲軟、政治

失序、民粹蜂起之時，社會主義中國這邊風景獨好，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也成為世界經濟和政治秩序治理的宣導者、推動者和型塑者。

在中國改革開放近 40 年後的今天，社會主義中國同樣要擁抱資本主義，也同樣需要世界資本主義所擁抱。但是，其方向和勢能已經轉向。前 30 多年是“引進來”為主，當前以及之後是以“走出去”為主，在世界範圍就是宣導“一帶一路”建設以及其他區域合作計劃，在本國範圍就是在實行資本主義的兩個特別行政區不斷提高社會主義因素，不斷抵消或遏制資本主義發展到今天所日益累積的負面效應，讓兩地同胞與內地一道共用民族復興的偉大榮光。

（二）“一國兩制”：多維模式與化約認知

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指出，“香港、澳門回歸祖國以來，‘一國兩制’實踐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功。事實證明，‘一國兩制’是解決歷史遺留的香港、澳門問題的最佳方案，也是香港、澳門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習近平多次高度肯定“一國兩制”在港澳地區實踐的成功，但是基於“一國兩制”的國策地位和港澳兩部基本法在國家法律體系當中的地位和作用，其實對於“一國兩制”實踐成效的肯定和判斷，絕不應僅限於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而是應從國家全域和中國發展大局當中去判斷和認知。只有這樣，才能看到“一國兩制”在改革開放以來國家發展當中的獨特地位和作用，也才能更加準確地認識“一國兩制”自身內在的結構和功能，也能就此領會“一國兩制”這一制度體系在我國存在並發生作用的長期性和複雜性。

首先，“一國兩制”是一個三位一體的多元聚合功能模式。我們不能僅從字面簡單地將“一國兩制”理解為在社會主義制度為主體的國家之下內地實行社會主義制度而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實行資本主義制度，而要從“一國兩制”的制度構造本身出發去分析和發現它的功能使命及其演進狀況。從這一視角看，“一國兩制”其實就是三個功能模式的疊加，具有很強的多維聚合特徵。第一，“一國兩制”就是國家在新的歷史時期制定的一個“統一模式”，專門用以解決港澳台三個具有歷史遺留問題的地區。第二，由於政策制定時資本主義制度發展生產力的能力要高於社會主義制度發展生產力的能力，因此通過“一國兩制”這種制度來確保運用資本主義制度繼續讓港澳地區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狀態，因此它也是一種“發展模式”。第三，無論從港澳地區來看，還是從國家全域來看，“一國兩制”都是一種“治理模式”，並且隨着中國共產黨的執政意識的不斷增強和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不斷推進，“一國兩制”的治理功能模式也將得到不斷強化。十九大報告將之列入中國共產黨應長期堅持的十四個基本方略之一就是一個明證。

其次，“一國兩制”三維功能模式的動態變化。“一國兩制”的這種多元功能模式絕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具體的並且隨着時間的發展而有所增減和消長，但是多數人則既忽略了“一國兩制”的多維功能觀，更無視“一國兩制”的多維功能的消長現象。第一，對於“一國兩制”的“統一”功能而言，已經隨着港澳歷史遺留問題的解決、它們回歸祖國的懷抱而完結，但是從國家全域來看，還寄希望於用它來解決台灣問題，因此這一功能實際已經超出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之外了。但是這一“統一”功能模式的完結與附加特徵，卻在一定程度上對於中央和香港認知與運用“一國兩制”帶來多重牽制，甚至產生路徑依賴。第二，對於“一國兩制”的發展功能而言，回歸 20 年來，香港及澳門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得到明顯提升，繼續保持繁榮穩定局面，總體十分成功，但是其內部固有矛盾也在不斷累積並持續爆發出來，已經嚴重制約特區的持續健康發展。也就是說，“一國兩制”框

架下的資本主義制度的發展功能，受制於資本主義自身的制度局限以及全世界範圍內資本主義經濟和政治制度的現實困境，香港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和發展功能也受到了越來越多的挑戰，已經到了一個改革的關口。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在中國改革開放的長時段、大格局下，“一國兩制”的發展功能對於國家的發展全域而言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如習近平在“七一”視察香港時所說，“香港各界人士積極投身國家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作出獨特而重要的貢獻”。也就是說，“一國兩制”發展功能優越性的發揮，在這30餘年當中，應跳出香港而從全國發展大局當中來看可能會更加準確客觀。隨着社會主義發展模式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原來的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的優越性已經越來越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模式的優越性所取代，資本主義的制度優勢已經大幅淡出。具體到當前的香港社會，在“一國兩制”制定時的資本主義積極因素隨着其回歸祖國、國家改革開放的日益深入以及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普遍困境而不斷受到削弱，因此其發展功能的發揮無論在國家大局和香港自身而言可能都在下滑，這一趨勢既是由資本主義的制度本性所決定，也是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所決定，其趨勢不可逆轉。第三，對於“一國兩制”的治理功能而言，它是建立在其發展功能基礎之上的。由於前述其發展功能的逐步弱化，其治理功能也就打了折扣。回歸以來，特別行政區政府施政日益困難，經濟發展面臨不少挑戰，傳統優勢相對減弱、新的經濟增長點尚未形成、住房等民生問題比較突出，而這些問題固然有反對派極力阻撓政府施政從而錯失發展良機的因素，但是當今世界資本主義制度的治理功能普遍弱化以及資本主義經濟和政治制度普遍面臨挑戰可能也是較為深層和基本的原因。

最後，“一國兩制”制度框架內的社會主義因素亟需加強。無論是從中國自身崛起以及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角度看，還是從中國日益走入世界舞台的中心、參與世界經濟和政治秩序的治理的角度看，還是從世界資本主義以及香港資本主義所普遍面臨的發展困境看，社會主義因素在世界範圍和國家範圍的增長已經蔚然成風，甚至將會開啟世界社會主義發展運動的一個新契機和新天地。在香港和澳門兩個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特區，近年來中央惠港、惠澳措施的不斷出台，港澳發展常態化納入國家發展五年規劃方案，以及十九大所強調的中央對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和將“一國兩制”確立為中國共產黨長期堅持的基本方略等等，這些都是充分發揮內地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不斷以社會主義因素去糾正和彌補資本主義制度的偏失。從這一角度看，“一國兩制”仍然具有強大、鮮活的生命力，“一國兩制”仍是具有世界創舉地位的最佳制度模式。

二、國家與香港：“全面管治權”的兩個重要面向

十九大會議結束之後，香港人最普遍最熱烈的關注點就是“中央對港全面管治權”正式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和政策話語，以及全面管治權成為中央治港的法治化、制度化、常態化的政策依據和政策工具。這種反應，既正常，也不正常。所謂正常，是將這句話放在當下香港較為蕭颯的政治生態以及香港與內地似融又拒的兩難關係中，產生這種應激性、排斥性的輿論反應，那是再為正常不過了。所謂不正常，就是回歸應然政治和法理邏輯，香港作為中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作為中央直轄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而部分港人對“中央對港全面管治權”這一政治語言表示憂慮、懷疑甚至抗拒，這當然是一種不正常的狀態。

香港社會截然對立的建制與非建制兩派之間，對十九大報告以及“全面管治權”提法的討論，無

論廣度和熱度都超過以往。反對派的頭面人物如李柱銘由此提出“一國兩制”“破產論”、戴耀廷提出中央今後治港的“威權論”、梁家傑提出中國共產黨的“書記治港論”等等歪曲和片面解讀。但是這也從另一個方面表現和聚焦了十九大之後中央治港方略及相關思路的一些新變化，其最突出的表現就是中央角色的凸顯以及中國共產黨在香港地位和作用的逐步公開化。

香港政界的最新進展都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先是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主任王志民在博鰲亞洲青年論壇上公開以中國共產黨員的身份宣講並分發十九大報告，這一事件本身即創下中國共產黨在港現身及宣講黨代會重要報告並向市民公開發放中國共產黨的報告的“三個第一次”。此風既開，中聯辦其他領導隨機在香港多個公開場合宣講十九大報告。如果還可以將這種行為看作中央駐港機構的“一家之言”的話，而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港澳基本法委員會主任委員李飛赴港宣講基本法，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王晨在港主持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選舉時也對十九大報告進行解讀並對參選資格作出明確嚴格的要求，色彩更為鮮明、“國家化”更為突出的以冷溶為團長的中央宣講團到港專門為行政長官以及 240 多位政府高級官員講解十九大報告，另外還有全國政協副主席在團結基金成立 3 週年慶典晚宴上的講話中也多次提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重大作用，所有這些都充分說明了十九大後中央治港新時代的到來，那就是“一國”原則更加突出，中國共產黨作為全國執政黨的地位也必然包括並涵蓋到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

當前無論是香港還是內地，對於“全面管治權”的理解，基本上都是以香港為出發點或立足香港來看，中央對香港具有自上而下的全面管治權力。對之比較全面準確的理解是，首先，中央對香港權力絕不僅限於國防和外交兩個方面，而是包括全方位的權力。其次，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是來自中央的授權，是中央將一部分管治權力依法授予特別行政區政府行使。再次，雖然中央授出部分對特別行政區的管治權力，但是中央根據憲法和基本法仍肩負並行使管治特別行政區的憲制責任。復次，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作為管治香港的責任主體，中央依法行使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監督責任和問責權力。最後，根據憲法和基本法的規定，中央直接行使對特別行政區管治權的權力主體包括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國家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中央軍事委員會。

應該說，根據香港政治形勢的最新發展和十九大精神的最新要求，上述對於全面管治權的理解已經不夠全面，或者說對於全面管治權的認識應該與時俱進、不斷拓展，以跟上時代發展的步伐。也就是說，我們現在對於全面管治權的理解，不能僅限於香港本身，還要回轉到其源頭，來看看對香港擁有管治權的權力主體還有誰，以更加符合“全面管治權”在中央層面的“全面性”。由此出發，在中央層面，對香港擁有並可以直接行使管治權力的主體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角色，那就是中國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會。否則，從法律邏輯和實踐邏輯上都存在一些盲點、難點或易於混淆之地。

其實，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及其中央委員會在特別行政區的領導權問題在具體實踐當中只是隔了一層紙，沒有捅破而已。可以說，憲法是特別行政區之源，在基本法中都明確指出根據憲法設立特別行政及制定基本法。因此，2014 年 6 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首次將憲法與基本法並列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從此，憲法在特別行政區的最高法律地位問題已經日益明晰，也逐漸為港澳同胞所接受。白皮書指出，“憲法和香港基本法共同構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憲法作為國家的根本法，在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在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範圍內具有最高法律地位和最高法律效力。”此後，習近平在多個重要場合發表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香港特別行政區憲制基礎的重要論斷。他在“七一”視察香港的講話中指出，“回

歸完成了香港憲制秩序的巨大轉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共同構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憲法是國家根本大法，是全國各族人民共同意志的體現，是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法律淵源。”在十九大報告中則提出要求，“牢牢掌握憲法和基本法賦予的中央對香港、澳門全面管治權”，“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

憲法在特別行政區地位的逐步凸顯，預示了中國共產黨及其中央委員會在管治特別行政區的地位和作用的呼之欲出、如箭在弦。憲法序言從歷史和現實多個角度指明和規定了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的領導地位，並指出憲法“規定了國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務，是國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國各族人民、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準則，並且負有維護憲法尊嚴、保證憲法實施的職責。”這些規定和要求當然包括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因此，根據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最新精神和港澳“一國兩制”實踐的最新需要，根據憲法的明確規定，應該公開指出中國共產黨及其中央委員會在特別行政區的管治權力和地位，而沒有必要遮遮掩掩，猶抱琵琶半遮面。

三、一個或十四個：中共的基本方略在特別行政區的運用

(一) 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和使命涵蓋港澳台

平均思想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要素之一，儒家指出了民眾“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內在心理，道家則闡明了“損有餘補不足”這一“天之道”的內在合理性與社會發展的必然邏輯。再引伸一步，古代的平均思想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另一個重要面向——關於治國理政的民本原則的理論淵源。中華民族數千年的文明史，就是人民大眾不斷追求均平理想和皇權統治不斷背離民本初心以及二者相互衝突、調適以致殘酷鬥爭的歷史。這一歷史過程一直無解，一方面使中國傳統社會呈現高度的穩定性和發展的週期性，另一方面導致皇權嚴酷下的民生凋敝以及中國近代的沒落。

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就是為了謀求救國救民的真理及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十九大報告開篇就指出了這一點：“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應該說，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和使命，就充分吸收了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平均思想和民本思想。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曾有句很重要的話，“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就充分說明了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之間的關係。這與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所說的“全黨同志一定要永遠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永遠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作為奮鬥目標”有着高度的一致性。

在鄧小平和習近平的講話裏，“人民”是包括港澳台三地的同胞的，不管當時和現在它們與內地的政治狀態如何。也就是說，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在宣示其治國理政的最終目標時，不僅直接針對內地人民，當然也包括港澳台三地同胞，包括讓這三地同胞也“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和同樣把這三地同胞“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作為奮鬥目標”。這一點是從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的初心和使命決定的。從這一角度來看，鄧小平開始提出“一國兩制”的時候，香港就正式納入了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一部分；或者更早，從新中國剛成立時所提出的“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對港工作方針的時候，香港就納入到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一部分了。

正因為如此，十九大報告才多次強調：“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讓香港、澳門同胞同祖國人民共擔民族復興的歷史責任、共用祖國繁榮富強的偉大榮光”。

（二）中國共產黨的治港方略是一個整體

十九大報告的最大特點就是確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全黨和全國人民中的領導地位，並且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長期指導思想。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由 14 個基本方略組成，而港人最為關心的是“一國兩制”成為 14 個基本方略之一，並且很自然的，大家都認為“一國兩制”就是中國共產黨治理香港的基本方略。其實，也不盡然。“一國兩制”當然是中國共產黨和國家治理香港的最主要方略，但是面對當前香港“一國兩制”實踐當中所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和新挑戰，僅靠它也不一定能夠完成治理任務。從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完整性、系統性和科學性的角度來考慮，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各個基本方略之間也是相互聯繫、互為支撐、共同作用的。缺少了任何一個，其治理效能就可能打折扣。這既是一個邏輯問題，更是一個十分嚴肅的實踐問題。因此，從理論和實踐來說，中國共產黨都會或者都應該綜合運用 14 個基本方略一起來治理香港。根據改革開放近 40 年內地社會主義建設的巨大成就，我相信香港目前的所謂問題都會在這種綜合治理模式下迎刃而解。

為甚麼以前不這麼提，也不這麼做呢？這就是十九大報告的偉大貢獻了。正是在十九大，確立了“一國兩制”在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當中的基本方略的地位和作用，這是前所未有的；正是十九大，確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及其 14 個基本方略，這是用於解決當前中國所面臨的各種問題、指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踐的最科學、最先進、最適切的理論體系，這也是與以往不同的；還有就是習近平高度重視香港“一國兩制”實踐，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對於香港各方面發展都具有極強的針對性和指導性。因此，十九大召開以後，中國共產黨對港澳的治理也將進入一個新時代，其最大標誌就是從單一施策向多方略的綜合運用轉變。這從另一角度也呼應了中央對特區“全面管治權”的貫徹落實問題。

（三）治港方略具體實施的可能

十九大報告所列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 14 個基本方略，對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的治理都具有重大指導意義，因此都應該從適當的角度和領域去做不同程度的貫徹和落實。以下按十九大報告的行文順序，依次談一談在港實施的可能性問題。

“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是第一項基本方略。香港特別行政區作為中央直轄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中央對特區的領導是毋庸置疑的。十九大報告指出，“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報告還強調指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明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由此可見，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中國的獨特領導地位。實際上，中國共產黨的“一國兩制”基本方略，就是中國共產黨在港澳地區領導地位的法律化、制度化的具體體現。再進一步，只要認同了中國共產黨在港澳地區的領導地位，那麼中國共產黨對港澳地區的治理就不應僅限於“一國兩制”這一項基本方略，而應當包括中國共產黨的其他基本方略。

充分體現這一思想的，是習近平在“七一”視察香港時的講話所指出的，“我們既要把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地建設好，也要把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建設好。我們要有這個信心。”在香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首先就是要堅持“一國兩制”基本方略，要全面準確理解“一國兩制”方針，要按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要尊重和認同中央對港的全面管治權，並且發揮香港的最大優勢，充分融入到國家發展的大局中去，要共擔民族復興的歷史責任、共用祖國繁榮富強的偉大榮光。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是第二項基本方略。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治國理政理念，不僅是對中國傳統民本思想的繼承和發展，也是中國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這個基本方略，不僅是中國共產黨在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地運用，也對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有約束和規限作用。

中國共產黨當然不會直接干預特別行政區政府高度自治範圍內的事務，但是對其具體施政卻有着充分的監督權。這一監督權的監察範圍，除了是否危及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政治性事務外，也包括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施政是否或在何種程度上“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問題，其施政是否讓全港市民(尤其是基層市民和弱勢群體)分享到香港發展的經濟成果，以及是否共用到國家發展的經濟成就。而經濟利益的分配問題，是任何一位執政者都需要正確處理的核心施政問題，這也是文章開頭所說的已經滲透到中國人文化基因裏面的問題，還是市民最易感受、最易反應和最易傳導激化的問題。回歸以來香港社會的日益“泛政治化”，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利益分配導向問題應有一定的關聯。十九大報告中的第8個基本方略“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其實就是講政府在“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施政中的具體做法問題。

“堅持全面深化改革”、“堅持新發展理念”、“堅持人民當家作主”和“堅持全面依法治國”這第3-6項基本方略，主要是講如何推動經濟民生領域健康快速發展並保持活躍、和諧、民主的社會氛圍的問題。這些對於當前的香港而言，也是亟需堅持和貫徹的施政方略。沒有全面深化改革，如何改變香港的經濟結構並使之產生發展活力；沒有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用的發展理念，如何解決糾纏多年的政府弱化、利益固化、基層貧化、社會老化問題；沒有健全的民主制度、豐富的民主形式、多元的民主渠道，如何有效實現更為全面準確的“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沒有以憲法和基本法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沒有按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把“法治”作為香港的核心價值就成了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其嚴肅性和公信力就會受到損失與挑戰。

“堅持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和“堅持全面從嚴治黨”這兩個基本方略對國家的長治久安至關重要，但是由於這兩點與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關係不大，這裏略而不談。“堅持‘一國兩制’和推進祖國統一”前已談過，亦從略。

而“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與“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及“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則都與香港有一定的聯繫。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看似與資本主義的香港沒有關係，實際上由於“一國兩制”的制度設計，也就意味着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中國對某些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地區具有包容性和相容性，可以進一步推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對於香港的核心價值也具有一定的包容性和相容性，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體系從國家、社會和個人三個層面完全包括了資本主義所執着的民主、法治、自由、平等等價值理念。從這一點說，港人認同自己的價值，也不應排斥而是尊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不僅是當代中國的社會治理目標和生態文明追求，對於港澳或者其他地區都是如此，世界各地都對全球生態和氣候問題負有責任，

因為我們居住的是人類的共同家園。

“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與“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兩個基本方略具有對立統一關係，攸關國家的獨立性與世界的統一性。作為中國最為國際化的城市，香港既是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的重要一員，更是與世界上多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緊密的經貿與文化聯繫。從某種程度上說，在協助國家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宏偉藍圖方面，香港可以作出更多更大的貢獻。而在這一過程中，尤其是聯繫到香港當前的政治生態，香港只有在“統籌發展和安全”、“完善國家安全制度體系，加強國家安全能力建設，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基礎上，方能與國家一道“始終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

參考文獻：

1.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載於《人民日報》，2017年10月28日，第1版。
2. 習近平：《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週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講話》，載於《人民日報》，2017年7月2日，第1版。
3.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